

巴人文集

·回忆录卷·



宁波出版社

巴人文集

· 回忆录卷 ·

浙江省
社会科学学院

《巴人文集》编委会 编

宁波出版社

巴人文集·回忆录卷

目 录

巴人与《风下之国散记（代序）	… 谷斯范	（1）
旅广手记		（1）
印尼散记		（127）
附录		（467）
〔一〕 自传		（469）
〔二〕 忆宁波建党初期		（494）
〔三〕 巴人著译书目		（501）
编选说明		（509）

旅 广 手 记

目 次

第一章	出走	(5)
第二章	在幼稚园里	(11)
第三章	公平轮上	(18)
第四章	泰安栈	(26)
第五章	“走马上任”	(35)
附	特制曲尺	(42)
第六章	所谓革命工作	(45)
第七章	豈户船上	(54)
第八章	一个陌生的朋友	(61)
附	怀以仁	(69)
第九章	“攒纱帽”后	(73)
第十章	董挚声来访	(86)
附	註 虫	(93)
第十一章	蒋介石的底子	(102)
第十二章	“受宠若惊”	(108)
第十三章	最后一次的报导	(113)
第十四章	回乡后	(124)

第一章 出走

一九二六年六月的一天下午。是星期日，天气晴朗而美好。我同世楣正向北门外锦屏山上的公园走去。快要走到转向北门去的一条长弄上，竹书从后面紧急地赶来，我们停下了，他赶上了几步，气喘的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他那苍黄的瓢儿形的脸上，显得灰白而阴暗了。

“县政府派了警察来学校，正在找你。他们将要逮捕你，快走，别再去开什么座谈会，也别再回学校了。”

他说话时两眼直盯着我。我知道出了什么事。军阀们的铁爪正在从宁波伸到我们这小小的县城奉化。罪名大概也是明白的：“赤化分子”。

“走到哪里去呢？”我迟疑了一会，说，“可能还只恐吓一下，吓你离开这里，别中了计吧！”

“他们要把你抓起来的风声已经传的很久了。”竹书说，“这回已经派了警察来，显然不只是恐吓的了。”

世楣站在一边，一时没答腔。他也许在考虑今天我们去公园招待城里青年开座谈会的任务，他也许在回想去年来敌人方面几次用谣言攻势迫使仲隅从县中离开，而这回是否也是重施故技。但他听到了竹书的话以后，皱一皱眉，接着说道：

“也许这回真的要下毒手了。不久以前，宁波的段承泽，这镇守司令，不是把蒋本蓄抓起来了么？”他迟疑一下，“我看，你还是避一避风好。”

“避一避风？”

“走，我陪同你，就在这时，立刻，出北门走向宁波去。”竹

书义彤于色地说。

“那么，我真的要放弃岗位，走上流亡的路了吗？”我苦笑着。“这真是想不到的事。”

“还有我们守着呢。”世楣说，“我们的命运，看来决定于将要到来的北伐的形势，再说赵济猛、石德濂他们和我们刻社一些骨干合起来，还是有力量应战的。走吧，暂时避一避风更妥当些。”

这样，我的“运命”就在这三人的“路边会议”中决定了。

“走，赶到宁波去。”

当时，从奉化去宁波有两条路，一条出大桥到西坞，趁小轮船。但这时已经下午二点多钟了，显然赶不上轮船。一条出大桥到南渡趁夜航船。但敌人既然要抓你，不会不在交通码头上去找兜捕的。

“走去就是了。”竹书看我在迟疑，催促着说，“现在是二点钟，八十里路，八点钟可以走到。走吧。”

我们匆匆地走出北门，走过了北门外的大沙堤，就一直朝东往大路上走去。竹书走在前面，我跟着。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急速地走着。

不能不使我回想起最近的和过往的一些事，仿佛这些事就决定着这次出走的命运。

要我离开奉化，离开县立初中的恐吓，已经不止这一次了。两个月前，在一个深夜里，县议会里一个姓张的议员，算来也是刻社的社员，排闼闯进校来，直入我的卧室，形色仓皇地说道：

“你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我从县衙门那里得到消息，沈秉丞正在设法逮捕你。他们想用法律手续，控告你公然侮辱罪，因为你在《新奉化月刊》上，写文章骂法治协会的人。之后，他们就想在打官司当口，提出你有赤化的证据，把你当作一个赤化分子逮捕起来。据说，这还因为宁波镇守司令段承泽行文到这里要逮捕赤化分子，你就这样给算上是一个了。”

他气喘喘地说上了一大堆。之后，还加上断语说：

“真的，别的罪名还没有什么，只是赤化分子的罪名那是性命交关，要杀头的呢。”

我笑笑回答道：

“杀头？那确是性命交关的。一个人只有一个头，我又不是牛魔王。可是，我还不能离开这里。”

这自然使那位姓张的议员不免失望了。他摇摇头，悻悻然回去，仿佛深怪我不接受他的好意。

自然是好意，但我也怀疑他的好意。他虽然也是剡社的社员，但我认定他是两面派，私下里是和法治协会分子有勾通的。本来嘛，这剡社的组织不过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团体，不是彻底的革命派。从它形成的过程和组织成员来看，大致是可以这样说的。发起组织剡社的是在宁波当小学教员和日报记者的奉化小知识分子。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初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气，也有流入到这闭塞的中古式的城市。一些小学教员就有茫然的追求新风气的倾向。他们回想到辛亥革命之前，奉化曾经有过一度革新运动，一些留学过日本的乡下知识分子，首先创办了龙津中学，讲求新学，聘请日本教员，一时来学的，望风而至，连宁波的一些青年也要负笈到奉化这个山城来求学。这就引起了城里的官绅们遑遑不安，眼看这些革新派将会推翻他们的固有的势力，于是他们另办一个中学，叫凤麓中学，以资对抗。但不久以后，宁波建立了甬江中学，以后又改为省立四中和四师，这地处偏僻的奉化就办不下去中学了。于是都告停闭，成立了一个锦溪高小学校。而一些乡下士绅那时又向外发展，早在上海开了家书店，在宁波创办了日报，又在余杭创立了农林牧畜场，他们转向到实业救国的路上去了。……接受了五四新风气的一些青年就想起了这个光荣的传统，要来一次对奉化社会的改革，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，只是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出发，想用教育来改革奉化，隐约间抱

有“教育救国”的思想。恰巧，一九二三年浙江省实行所谓“省自治”，各县都设立起县议会来。这些青年就组织了一个剡社，来争夺这个县议会的议席，企图通过议会在奉化设立个县立初中。在争夺议席之间，城里士绅成立一个法治协会以与剡社相对抗。斗争在争夺议长席位时激烈地展开了。剡社拥戴忠义乡的老绅士庄嵩甫做议长。他正是清末创办龙津中学，在上海创办新学会社，在余杭创办林牧公司，抱着实业救国主张的维新人物。而法治协会为了维持他们在奉化的统治实权，则拥护城里巨绅戴南邨作议长。在议会成立的前夜，庄嵩甫正患着重病，法治协会趁此机会造谣说庄某已因年老病重不幸死掉了。一般从收买中得到选票的议员，纷纷倒向戴南邨一方。可是正当议会揭幕之日，庄嵩甫却矫健地到了会场，并且发表了演说，于是形势一变，过半数的议员都投向他，他终于被选为议长。剡社接着又吸收一批开明士绅做了社员，扩大了组织，并且不久以后，在县议会里通过了创办初中的决议。这样，一些剡社的骨干分子就在一九二四年春季来到了自己的故乡，聘请了竹书的父亲严老先生当了校长，在宁波一带当小学教员的胡行之、庄世楣和我的二哥王仲隅就回到故乡奉化来主持初中开办事宜，于一九二四年春季开学了。

那时候，宁波第四中学已由经子渊当了校长。一九二三年的夏季，浙江传来了经子渊来长四中的消息。曾为薛福成的幕僚、并据传曾经主张过杀秋瑾的宁波遗老张让三，首先出名致函反对。函电登载在报上，指斥经的罪名是宣传共产公妻，宣传赤化。那时，我们曾联名驳斥此项函电，并表示欢迎，这样，在宁波就发生了反经派和迎经派的笔墨之战，而经子渊却终于在一九二三年秋季来到宁波了。随着也带来了左倾的教员和新文化思想。一九二四年春，宁波的国民党分党部成立了，同时，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组织也成立了。实际策划奉化初中的胡行之，他们一方面部署力量，把我安插在离城十几里外的上田坂松林高小学校那里，另

一方面，又聘请了曾在四中教书的冯三昧等来当教员。冯三昧当时已是共产党员，但具有郁达夫型的人物。就在一九二四年四五月间，宁波党组织来信要我参加，并且说，参加了党也就参加了国民党，现在我们是跨党的。我从这时起就被指定与县立初中的冯三昧等发生联系。这就使国民党和我们党组织以县立初中为基地而悄悄地建立起来。同时，奉化初中是个赤化分子的巢穴的谣言也就大大地散布开来了。

谣言攻势首先被吓倒的是守旧分子，其次是动摇分子。到了一九二五年初，县立初中的教务主任胡行之，自动离职，去日本留学了。于是目标集中于被称为大炮手的王仲隅身上，连带攻击到冯三昧等。到了一九二五年下半年，剡社中有人建议王仲隅引退，冯三昧不再续聘，但把我塞进了初中，负起教务主任的职责来。于是，我们仍旧从宁波聘来石德濂和赵济猛两个党员来作教员，在学生中进行思想革命教育，并且还请来王以仁当高级班的国文教员，扩大新文学的阵地。此外，还把剡社的年刊改做了月刊，定名《新奉化》，由我主编。这样，我们除学校阵地外，又有一个舆论阵地了。正是这个刊物打击了法治协会里一些城狐社鼠，使他们对有置之死地而才快意的愤怒。而我自己也就成为站在战壕上的人物，被当作枪靶子来瞄准了。……可是到这时，剡社自然也分做了左、中、右三派，剡社中的右派士绅们日益动摇起来，又象希望我二哥一样希望我引退，我的引退也就是他们远离赤化嫌疑。但我们那时也并不知道怎样发展左派，争取中派，孤立右派。凡事只听它自然发展。我虽没有听动摇分子的“劝降”，但到了反动派真的伸出铁爪来以后，却不得不徒步出走了。

……大约走了三十里左右，竹书停下来对我说，“现在已过了奉化境界了，追捕也追捕不到你了。稍稍休息一下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我说，“我们放缓一些脚步就是了。再说，还有四五十里路要赶呢。”

一路上，为了赶路，我们之间很少说什么。只是关于到了宁波后投宿在哪里交换了意见。竹书是《四明日报》做过编辑和记者的，那里还有他的故友张乐尧等，他可以到报馆去投宿。而我则只有一个同乡，同时又是四师的同学王庆睦那里可以投宿。他是以他的夫人裘慎的幼稚园作为住家的。这幼稚园在后乐园附近的一条街上。进了宁波市区的时候，已经是黑沉沉的夜影笼罩了这个狭小逼仄的中古式的城市。我们分别后，就相互这样约定住址。

“可是，我将在明天回去，打听到情况后，再来通知你，如何决定行止。”竹书临别时还这么说，“可是你不想到广州去吗？几个月以前，那里不是有信来叫你去吗？”

“好吧，一切等今后的消息再说吧。”

我一个人走向后乐园那条街去。庆睦和裘慎两人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显现出来了。

第二章 在幼稚园里

每次两脚踏进幼稚园，总使我引起了一段回忆，一段轰动这中古式的宁波城市社会的事件。

宁波是我深锁在学校大门内读了五年书的故土。那时在我看来：统治宁波的是三件东西：东门外大街上商店里传出来的算盘声，各个中等学校里传出来的朗诵桐城派古文的读书声，外加半边街上那鱼行里的鱼贩的叫卖声。这三种声音就构成这中古式城市的特色。五四运动发动了，带来了抗日爱国运动；首先是四师的学生和其他中学的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；其次是由《时事新报》的记者和一个宁波流氓土绅领导的，以小市民和打手为基础的十人团，他们共同展开了抵制日货，焚毁日货的斗争。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依然抗拒于阊门之外，写白话文是成为犯罪的行为的，也就是说，一定是个赤化分子。但日子推移过去，小学教学界里却暗暗地接受了当时所谓时髦的杜威的教育学说。我也没研究杜威的教育学说，只知道一句话：生活即教育。可是这方面的提倡者，在镇海有李冠卿，在鄞县有张承载。一九二二年上半年，胡行之、王仲隅和我也就被聘为蔡氏的星荫小学的教员，张承载就是那学校的教务主任。星荫小学还附设一个幼稚园，由张承载亲自领导。就在这学校将放暑假的时候，张承载突然失踪了，之后，又发现幼稚园的主任保姆也失踪了。于是社会舆论马上沸腾起来：一个提倡新教育的人士竟诱奸了幼稚园保姆，遗弃了自己的发妻，拐带潜逃了！街头巷尾以至代表社会舆论的报纸都纷纷发出各种各样的传说，念桐城派古文的人们不能不废书三叹，一叹人心不古，二叹自由恋爱，就是公妻，三叹公妻就是共产。于

是大家又认为共产这个“魔王”，已经悄悄地潜入宁波古堡，古堡里的子民大祸将要临头了。这就无怪一九二四年下半年经子渊被派来当宁波第四中学校长时，就有张让三其人带领遗老遗少，发动舆论界的虾兵蟹将，大事喧嚣，迎头反对了。而这个幼稚园，正是星荫幼稚园的后身，由裘慎接办下来的。

我常常想，大堤上一个小小的缺口，就能导致河流冲决堤防。这件恋爱纠纷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但在这个社会里，只允许拿算盘的买办们出入于妓院林立的后街，有时，桐城派也不免上那里去赋诗即兴，或在自己家庭里还经常出现相互通奸的事，唯独不允许这冠上自由恋爱字样的男女关系；于是这件小小的事件就成了开宁波的风气之先的一面小小的旗帜了。有反对，自然也有景仰。公开的反反对，暗地里的景仰。一个小小的幼稚园，却也有它历史的功绩呢。

这回我以“待罪之身”隐居在这幼稚园里，一样地想起了这一切。

当晚庆睦和裘慎招待我在那里住下。庆睦了解我出走的原因以后，就说，“宁波和奉化还不是一鼻孔出气，段承泽又是沈秉丞的上级，你在这里住下来是可以的，只是别往外面走动了。他们知道了你出走，一定会报告这里的镇守司令，也许会行文通缉呢。”

裘慎听了这话，皱一皱眉，似乎不以为然。她只平静而和悦地说：“放心好了，住着就是。”我虽然感到这一对夫妇的不同态度，但还尽量解除他们的顾虑，说道：“我还怀疑他们会真的逮捕我呢，多不过恐吓一下罢了。”

这样，我就暂时住在幼稚园的一间偏屋里，白天深居简出，夜晚就和裘慎夫妇俩闲谈。

论交情，庆睦是我四师的同学，比我高三级；又是同乡，两村相隔一个山头，只十几里路。并且一九二三年在慈溪的普迪小学里同过事。那时裘慎在江东林黎叔主办的达德小学教书。庆睦

在前妻亡故以后，由裘慎的舅舅介绍——他也是普通的教员——认识了裘慎，两人开始通讯。但据说，经过了一些波折，裘慎经常不回他信。而舅舅的折冲，庆睦的眼泪，却使她软下心来了。两人结缡以后，庆睦就不再教书，以裘慎所得的一份遗产作为资本，开立了一家竞新书社。白天，庆睦就在那书社里经营业务，晚上回幼稚园的住家。

算来，这一对夫妇也算是自由恋爱吧。

在过去的接触中，裘慎也曾告诉我关于她的身世。她实际上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是慈溪裘家的养父，在广东作官时领了她来的。那时她还在襁褓之中吧，现在再也记不得她的父母姓甚名谁了。因之她在家庭中往往受裘家亲子女的贱视和奚落。到她养父母死了以后，就有析产的争执。她托舅舅们的庇护，也分得了一份遗产，给存在钱庄里，还培养她读完了女师。她每一道及自己的身世，总感到凄凉与孤单，因之，她需要有人爱，也很容易爱别人。她有时有意无意的吐露：“我和庆睦的性格和兴趣并不一致，但他的苦恼和眼泪征服了我。”

幼稚园放学总比较早，庆睦没有从店里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也有时相互谈谈。她总爱谈些五四时学生联合会里的事。在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中，我是秘书长。她常常象要唤起我的回忆似的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，那时女师的代表就是我，我们不是常常在后乐园的一个亭子里开会的吗？”

我那时还是一个带有些女性的羞忸的青年，在会场中尽看到男女代表们那一套青年人免不了的相互讥嘲和调笑，但自己总不敢对一个女性目瞬一下的。

“你不记得吗？”她有时又说，“有一次开常务会，别的学校一个代表也没有到，只有你们男师和我们女师的。于是会开不成了，大家也就在园里玩一会。可是，这以后被传出去：男师和女师就成为一对夫妻学校了。”

自然，我还会记忆起这一切。便是在我们男师同学里，也常常爱讲起这个被称为“夫妻学校”的称呼，并且在课余之后，到月湖去划船。这女师校址在月湖的一个小岛屿叫做竹屿的地方，和男师的校址仅隔一条横跨月湖的陆殿桥。我那时也练习摇橹，常常同些同学把船划过陆殿桥去，在女师校舍的周围荡漾，这时候，照例有群女学生从窗口伸出脸来，成群的你推我挤着，发出窃窃的笑声和我们的橹声相应答。我有时向那窗口看，只看到一层层象黑云层似的黑发，黑云层下夹着白闪闪的“阳光”，阳光里浮着发亮的一对对象北斗星似的眼睛。但我们那时却缺乏青年人的诗情，桐城派古文掩盖了我们的灵魂，因之也没有放歌高啸的勇气，只是把船划得更慢更慢罢了。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是怎样的想法，而我只觉得这也算是一首无言的诗呢。

“那时，看来你是很能摇橹的。”裘慎似乎也记起那时的情景。“你们常常划船到竹屿来玩，我们总一窝蜂的看着你们。全都有一份孩子的天真呢。后来，我和庆睦结婚后，不是我们三人还一道去月湖划着船儿玩吗？你真是一个好舵手啊！”

裘慎总是爱同我谈些这种生活小事。

“可是现在不同了。”我接着说，“二四年经子渊长校以来，宁波的风气总算开通些了。但一时间四中虽然是个革命学校，而我们的男师和女师却还被宁波的学阀霸占着。前进的落后了。而从今年起，经子渊校长不是又被撤了职，反动力量不是又抬了头吗？今后的变化又不知怎样呢。”

裘慎对此也不免叹息。但她似乎对自己圈禁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，和外界运动一点也没有接触更感到苦闷。这世界真的也有各种各样的人，有一种人除自己的事业外，仿佛世界上再没有其他的事。社会运动的洪流在他的身边汤汤地流过，而他还象一个小小的孤岛似的站立不动。庆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现在正没头在他的书店的经营上，算盘子的上下是他唯一的哲学。资本真